

移植与融会:民国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美国学术渊源

阎书钦

摘要:民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日臻完善。孙本文等留美归国社会学家融会美国20世纪初新兴社会学理论,构建起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的完整社会学理论体系。20世纪初,分别以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研究中心的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在美国日渐兴盛。前者注重结合社会环境,考察人们外在行为;后者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注重研究社会文化。民国社会学者对美国两种社会学理论多取融会贯通之意,并力图有所创新。其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虽极具美国学术印记,但就将美国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理论整合为一个理论整体而言,具有相当创新性。

关键词:民国时期;孙本文;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09YJA770049)

作者简介:阎书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 300387)

社会学虽初创于欧洲,但洎乎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无论学者之多、著论之繁,抑或理论创新与学术影响之大,均渐超欧洲。对此,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本文曾谓,社会学发展之速“全世界莫过于美国”。^①20世纪初亦为美国社会学之重要嬗变期。此时期,注重研究人们内在心理的早期心理社会学日渐式微,而结合社会环境考察人们外在行为的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考察社会文化的文化社会学则异军突起。20年代以降,随着留美归国学者渐居学术中心位置,民国社会学界遂与美国社会学潮流亦步亦趋。民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之构建,虽以孙本文为祭酒,但亦为吴景超、吴文藻、吴泽霖、杨开道、许仕廉、应成一等诸多学者努力之结晶。他们不仅极具求新意识,所引介者皆为美国当时最新社会学理论,且对美国各家社会学理论多取融会与创新之意。他们以融会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为基础,逐渐构建起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的完整社会学理论体系。

一、芝加哥大学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对民国学界的影响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注重考究人们内在心理,到结合社会环境解析社会心理,再到结合社会环境分析人们外在社会行为,为美国社会学演进之一主脉。由此,美国早期心理社会学发展而为社会行为分析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美国学界的早期心理社会学,注重由人们内在心理解析社会现象,认为

^① 孙本文《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见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上海:东南书店,1930年,第115页。

“人类社会现象不过人类心理作用的表现。人类心理作用是社会现象的原动力”。^① 布朗大学教授沃德(L. F. Ward) “欲望”(Desires)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季廷史(F. H. Giddings) “同类意识”(Consciousness of Kind)说、芝加哥大学教授司马尔(A. W. Smal) “兴趣”(Interest)说等皆为其代表。20世纪初,尤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美国学界始强调结合社会环境研究社会心理或行为。此派学者以柯莱(C. H. Cooley)、爱尔乌德(C. A. Ellwood)、汤麦史(W. I. Thomas)、派克(R. E. Park)、蒲其斯(E. W. Burgess)诸人为代表。除柯莱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并长期担任该校教授外,他们多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关系密切。爱尔乌德虽为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 - Columbia)社会学系教授,但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其导师即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创立者司马尔。汤麦史亦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18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3年方调任纽约社会研究新校(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授。派克、蒲其斯则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柯莱、爱尔乌德等首先提出结合社会环境解析社会心理。柯莱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同一现象的两面,社会学须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心理问题。^② 爱尔乌德则提出社会心理交互论,认为社会是由人与人相互的心理作用而成的集团,人们之间的相互心理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③ 继柯莱、爱尔乌德后,汤麦史在《欧美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5, Vols, 1918 - 1920)等书中,派克和蒲其斯在《社会学导言》(*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等书中,均强调结合社会环境分析人们外在行为。

柯莱、爱尔乌德等环境心理分析理论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诸社会学论著影响广泛。朱亦松于1928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原理》即强调以社群为单位,结合社会环境考察社会成员心理。他解释,社群由社会中具有共同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成员组成。个人深受社群的影响,“个人心理之发达,须在社群环境之中,始得有其根据”。^④ 其中,爱尔乌德社会心理交互论对中国学界影响尤其深远。赵作雄于1920年12月将爱尔乌德《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al Problems*, 1910)译出版,扩展了爱尔乌德此论在中国的影响。孙本文介绍,此书译本在中国“风行一时,可说国人之稍知社会学,在初期此书的影响甚大”。^⑤ 受其影响,诸多民国社会学家对社会概念的理解,亦极强调社会成员间的心理交互作用。1923年出版的德普、延年合著的《社会学入门》即称,“社会成立的原素,便是‘各人心的相感作用’(mental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s)”。^⑥ 爱尔乌德《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和《社会心理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1917)亦为王平陵1926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的主要理论来源。^⑦ 孙本文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即对爱尔乌德著作兴趣浓厚。^⑧ 他在阐述社会行为问题时,特别强调其中的心理交互内涵。1929年,他在《社会学的领域》中表示,“凡是二人以上集合而互相交通所表现的共同行为,就是社会行为”。^⑨ 社会行为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二人以上的集合、二人以上集合后的“互相交通”。^⑩ 1934年3月,言心哲在《农村社会学概论》中亦引爱尔乌德所言: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心理结合是最切要条件,“若是仅止因为有同样的经济环境,或是住的地点接近,还不能成社会。必定是因为心性相感,或者说因为‘内我’(Inner self)相联络,才能成作一种同共的生活,是之谓社会”。^⑪

① 孙本文《世界社会学之派别及其现状》,见孙本文等《从社会学到社会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7页。

②③ 参见李剑华《社会学史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100、102—103页。

④ 朱亦松《社会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5页。

⑤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第22—23页。下引此书,文中夹注书名、页码。

⑥ 德普、延年《社会学入门》,上海:世界书局,1924年,第25页。

⑦ 参见王平陵《编者之言》,见王平陵《社会学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第2页。

⑧ 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41页。

⑨⑩ 孙本文《社会学的领域》,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第11、9—10页。

⑪ 言心哲《农村社会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281—282页。

就芝加哥大学对中国的学术影响而言, 爱尔乌德的影响仅属间接性质。较早向中国直接引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者, 为 1925 年瞿世英译鲍格达(E. S. Bogardus) 《社会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1913)。鲍格达于 1911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后任南加州大学教授, 学术上属芝加哥学派。孙本文介绍, 此书简明介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法, 为“代表芝加哥社会学派之初步著作”。^① 瞿世英译本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 对中国学界影响较大(《当代中国社会学》, 第 28 页)。不过, 鲍格达此书出版于 1913 年, 仅反映芝加哥大学早期社会学理论。直接引介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行为分析方法者, 首推孙本文。

孙本文在美留学期间, 虽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对哥伦比亚大学文化社会学了解较多, 但一直关注芝加哥大学社会行为研究。他于 1925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 于当年秋专程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做访问研究, 选修社会行为研究大师范黎庶(E. Faris) “高级社会心理学”与“社会态度”、派克“集体行为”等课(《当代中国社会学》, 第 241 页)。他对该系评价甚高, 于 1926 年 12 月表示, “目前美国各大学之社会学科, 要以芝加哥为最完备。不但所设功课较多, 而且研究方法亦切实, 持严格的科学态度, 以分析社会现象。”^②

孙本文参考同属芝加哥学派的汤麦史、范黎庶、白乃德(L. L. Bernard) 诸人相关论述, 集中分析人类态度问题, 进而阐发社会环境、态度、行为三者的关系。汤麦史于 1918 年在《欧美波兰农民》中始用“态度”(Attitude) 概念说明人的心理状态, 将态度称作动作(或行为) 的趋势(tendencies to act)。芝加哥大学教授范黎庶于 1925 年在《社会态度概念》一文中, 将态度称为“姿态”、“未完全的动作”或“动作的趋势”。^③ 白乃德为司马尔弟子, 1910 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明尼苏达大学、康乃尔大学教授。他于 1926 年在《社会心理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1926) 中, 将态度视作“未完成的或可能的适应的行为过程”(uncompleted or potential adjustment behavior process)。1935 年 1 月, 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综合上述意见认为, “态度”是人们应付社会环境刺激时的“心理状态”, 态度决定行为。所以, 他特别强调社会环境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制约作用, 认为“一个人自从呱呱坠地而后, 处处须应付环境的刺激。在应付环境刺激的过程中, 就学得无数的习惯的行为或规定的反应(habitual behavior, or conditional response)。此种习惯的行为, 渐渐累积起来, 并组织而成行为的系统。此种行为的系统或习惯系统, 遇到事物刺激的时候, 就会自动反应。态度就是此种自动反应的习惯系统的表现”。^④

孙本文大力引介汤麦史、派克、蒲其斯的人格分析(personality analysis) 理论, 强调将人性与人格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汤麦史先后于 1918 年和 1923 年在《欧美波兰农民》、《失调协之女子》(*The Unadjusted Girl*, 1923) 等书中提出, 人类具有求新知(new experience)、求自己表现(recognition)、求安全(security)、求同情或感应(response) “四种根本愿望”(the four wishes), 人们这些愿望需要通过社会制度和组织进行调节。^⑤ 派克、蒲其斯 1921 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言》强调“人格分析”重点在于区别“个人”(individual) 与“人”(person): 个人指生物人; 人指处在社会环境中的社会人。^⑥ 1927 年 1 月, 孙本文在《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中, 将汤麦史称作人格分析派代表, 亦强调“人”与“个人”之不同, 认为“人”乃处于社会境遇中的“个人”, 要研究“个人”, 须研究“个人”所处的社会及其制度(《社

①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 第 250 页。

② 孙本文《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 见孙本文《文化与社会》, 第 143 页。

③ E. Faris, *The Concepts of Social Attitud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9, 1925.

④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 第 210 页。孙本文关于态度与行为的论述, 参见孙本文《人类态度与文化》, 见孙本文《文化与社会》, 第 16 页。

⑤ 参见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 北京: 朴社, 1927 年, 第 9—10 页。下引此书, 文中夹注书名、页码。

⑥ 参见叶法无《近代各国社会学思想史》, 上海: 大陆书局, 1933 年, 第 130—131 页。

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9页)。1935年1月,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参照派克、蒲其斯《社会学导言》相关论述,讨论人性和人格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首先指明人的本性与人性的区别,强调人性是人类在社会环境中养成的共同行为特征,而本性则指“人类初生时所具有的共同特质”。^①他引派克、蒲其斯的观点,人类不是生下就成“人”的(Man is not born human),人惟有与其同侪发生很缓慢的很继续有效的接触、合作与冲突,才养成人性的特质。孙本文进而分析,“人格”(personality)即个人所具有的“性质”,表现为个人特殊的习惯系统,同样由社会环境养成,“社会环境所供给的刺激的性质,可以决定人格的特质。”^②在人格分析方面,孙本文尤其推崇汤麦史与齐南尼基(F. Znaniecki)合撰《欧美波兰农民》。1935年1月,他在《社会学原理》中,极推崇此书研究方法,认为该书第1册《研究法导言》对社会研究的理论及方法讨论精辟,“为全书精彩”。^③1944年12月,他甚至将1918年至1920年此书5册的出版视作社会学“真正入于有系统的客观科学的研究”的标志。^④

看重美国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实为20年代留美归国学者的普遍倾向。中央大学心理系教授潘菽在为孙本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撰写《社会的心理基础》时,即系统参阅派克与蒲其斯《社会学导言》、白乃德《社会心理学概论》等美国社会行为分析著作。^⑤与孙本文一样,潘菽亦强调由人们心理交互影响导致的社会行为是分析社会的中心点。他强调行为分析是社会分析的首要问题,“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的方式和规律对于社会的关系是根本的、主要的。其他的条件可说是间接的、辅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社会,必须首先了解形成社会的个人的行为。这是社会的心理的基础”。^⑥

20世纪初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美国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强调将社会行为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在民国社会学界,虽然对此种理论的系统阐释仅以孙本文较充分,但民国时期诸多社会学家大都受其影响。一方面,孙本文以社会行为分析为中心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被民国社会学界普遍认可;另一方面,派克、蒲其斯等以社会行为分析为基础、结合社会区位(position)提出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理论,曾对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乃至吴文藻、赵承信等燕京大学学者的社区研究理论产生深刻影响。

二、民国学界对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移植

除德国历史派文化社会学外,20世纪20年代所谓文化社会学主要指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乌格朋(W. F. Ogburn)首创的文化社会学。而英国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布朗(R. Brown)等文化功能派理论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仍基本囿于人类学领域。美国文化社会学的兴起,表明美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由起初的内在心理,到外在社会行为,最终扩展到社会文化。

耶鲁大学教授孙末楠(W. G. Sumner)的民俗论为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先导。其于1906年出版的《民俗论》(Folkways, 1906)注重民俗(folkways)、俗型(mores)、制度(institutions)等问题的研究,并将民俗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孙末楠所言“民俗”,其内涵与文化概念颇多重合。他将民俗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与此后乌格朋将文化概念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实异曲同工。不过,美国文化社会学的正式兴起则在20年代,以哥伦比亚大学为重镇,乌格朋于1922年出版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1922)为此派社会学发轫之作。乌格朋早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为该校人类学教授鲍亚士(F. Boas)和社会学教授季廷史弟子。1919年后,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彭纳女子学院经济学和社

①② 参见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第197、206页。

③ 参见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第267页。

④ 孙本文《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与趋势》(1944年12月),见孙本文主编《现代社会科学趋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9—10页。

⑤⑥ 参见潘菽《社会的心理基础》,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第103、4页。

会学科主任、教授,并任政治学院社会学教授。他将以鲍亚士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考察初民社会的文化分析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现代社会研究。孙本文介绍“大概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之学说,都根据新派人类学家之论点。所以,谓文化学派全系由人类学脱胎而来,亦无可。”(《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37页)南加州大学教授恺史(C. M. Case)是20年代美国另一位重要文化社会学家。他于1924年出版《社会学大纲》(*Outlines of Introductory Sociology*, 1924),阐发文化社会学理论。但恺史与乌格朋并非师出同门。他于1912年在沃德门下获得布朗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师从罗斯(E. A. Ross),于1915年获得博士学位。文化社会学由乌格朋与恺史的倡导,2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蔚成风气。孙本文认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由此从“心理学说”转向“文化分析”,由“主观臆想时期”进入“客观分析时期”(《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49页)。除乌格朋、恺史外,20年代美国文化社会学代表人物还有乌格朋弟子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社会学教授卫莱(M. M. Willey)、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海史各费(M. J. Herskovits),另外还有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教授汉根史(F. H. Hankins)等。

孙本文曾于1922年至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可谓美国文化社会学兴起的亲历者。他回忆,1922年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听乌格朋“社会问题中的心理要素”课。此课虽名为“社会问题中的心理要素”,但重点分析社会变迁问题。其时乌格朋《社会变迁》正值出版,经其老师季廷史称许,乌格朋遂得大名。“著者适逢其会,不但亲接其讲演指导,印象极深,且因此而悟社会变迁的研究为社会学上极重要的部分”。^①所以,他于1926年回国后,先后于1927年1月和1929年10月出版《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和《社会变迁》,向国内引介美国文化社会学理论。孙本文称自己“确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重视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历史事实,当仁不让”(《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46页)。其中,《社会学上之文化论》虽以介绍乌格朋《社会变迁》为主,亦兼及恺史、海史各费诸人相关论述(《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例言,第1页)。

文化概念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Tylor)较早阐发。1871年,他在《初民文化》(*Primitive Culture*, 1871)中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学得的能力与习惯。”^②1922年,乌格朋在《社会变迁》中补充泰勒的定义,认为文化不仅包括泰勒所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非物质文化,还应包括建筑物、工艺品等物质文化(《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52—53页)。孙本文大力引介乌格朋有关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部分的观点。1928年4月,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演讲时称“人类生活,原是一种对于环境的调适作用。在这种调适环境以维持生活的时候,便有种种相当的产物。文化就是这些对于环境的调适的产物。”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衣服、宫室、车舟、桥梁、机械、什具等有形的物质文化与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无形的非物质文化两方面。^③1929年8月,他又在《社会的文化基础》中说明,“凡人力所创造之具体的事物,叫做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例如衣服、舟车、桥梁、机械、器具等是”;“凡人工所创造之抽象的事项,叫做非物质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例如风俗、法律、宗教、道德之类,皆是”。^④孙本文进而将文化视作社会学研究的基础。1927年1月,他在《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中提出,社会学研究应由心理分析转向文化研究,“普通社会学家,往往解释社会现象,用心理要素概括一切,以为社会现象多由心理构成,其弊即置文化于不问,卒之想象构思不能得其要领”(《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11页)。他接受乌格朋的观点,将社会变迁等同于文化变迁。他在《社会的文化基础》中说:“文化是人类社会最彻底、最普遍的一种势力。”^⑤文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核心,“社会变迁,除开人口

① 孙本文《社会变迁》序,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第3页。

②④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第24、27—28页。

③ 孙本文《文化的特性》,见孙本文《文化与社会》,第2页。

⑤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序言,第1页。

的生物变动外,只有文化变迁”。^①1929年10月,他在《社会变迁》中又强调,即便人口变迁亦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人类可以通过避孕、堕胎等方法减少生育,可以通过发展医疗减少病痛,延长寿命,控制死亡,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可以改变人口的地理分布。^②

对于美国文化社会学的引介虽以孙本文为主,但此理论对民国诸多社会学者影响广泛。黄文山、潘菽、应成一等在美留学期间对文化社会学有直接了解者,亦多介绍此种理论。黄文山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亦为乌格朋的学生,对美国文化社会学了解颇深。1929年10月,他在《社会进化》中强调,社会进化就是文化进化,“我们研究社会的进化差不多就是研究文化的进展”。^③潘菽曾于1923年至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对乌格朋文化社会学理论亦有相当了解。1930年5月,他在《社会的心理基础》中表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环境,“人类所有的环境,除了天然的以外,所有由人类自己而来的都叫做文化”,^④“现在我们所住的、所吃的、所用的、所欣赏的、所思考的、所要改变的、所与他人讨论的,差不多没有几件不是人类自己所造的。这种种人类自己所造的生活的资料和倚托便是所谓文化的一部”。^⑤应成一曾在威斯康星大学从罗斯攻读社会学,回国后任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32年11月,他在《社会学原理》中介绍乌格朋文化失调理论说,“文化落后”(culture lag)名词“为奥格彭(William Ogburn)所创铸。奥氏著《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一书,以为社会中一切文化,皆应有变迁者,但变迁之速率不同。从社会全部而言,各种文化单位,本是彼此提挈联络,不能其余单位不变而一个单位单独的变化。但是,社会上单位单独变化之事究不能免,一个单位突然告变之后,则整个文化立时发现失于调剂,文化内容,自起冲突,增加人类之痛苦,”从而引起诸多社会问题。^⑥

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初,更多论者通过间接途径了解美国文化社会学理论。1925年至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许仕廉通过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鲍亚士弟子克鲁伯(A. L. Kroeber)相关论述,了解到美国社会文化研究。他将人与社会、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并注意到社会文化变迁问题,认为“人、文化、社会三项,是相连不分的。人之所以为人,而别于普通动物者,有文化耳……社会而无文化,非形聚,即兽群,决不能成社会。人与社会文化互相作用,于是人事益繁,变变相寻,遂有演化”。^⑦他介绍,克鲁伯于1917年春夏发表《超生理界》(The Superorgan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pril-June, 1917),说明生理演化与社会演化的区别;又于次年3月发表《社会心理学之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ch, 1918),申明四界现象之义:最上级为文化现象;上级为心理现象;中级为初级有机现象;下级为无机现象。^⑧许仕廉由此认为,文化是超乎人的生理、心理之上的社会现象,“文化之创造,使人超出于有机界现象及心理现象之外,别发生一界现象”。^⑨1928年5月,朱亦松借鉴美国民俗论阐发社会文化问题。他参考孙末楠弟子耶鲁大学教授恺莱(A. G. Keller)所撰《社会演化》(Societal Evolution, 1915),撰写《社会学原理》第3编《社会演化》。他将文化称作“风习”,认为“社会演化之途径,亦即文化之途径。所谓文明者,即一切制度总和是也。自广义言之,凡事之已确立固定者,皆得谓之曰制度,或谓之曰风习。是故一切创造,一切典章文物,一切风俗,一切经济生活之方式,皆可以制度二字看之,或以风习二字名之。其唯一之功用,则在于适应环境焉”。^⑩余天休1931年2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对社会文化问题的阐述借鉴孙末楠《民俗论》。他介绍文化概念说“人种因处境不同,初而有风俗习惯之异,再而有文明文化之差别。

①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第126页。

② 孙本文《社会变迁》第11—12页。

③ 黄凌霜《社会进化》,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1页。

④⑤ 潘菽《社会的心理基础》,第100、101页。

⑥ 参见应成一:《社会学原理》(上),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第396页。

⑦⑧⑨ 参见许仕廉《文化与政治》,北平:朴社,1929年,第35、12—13、7页。

⑩ 朱亦松《社会学原理》,第183页。

文明者,人类适应环境之程序也;文化者,人类采用某种程序,而适应其环境之成绩也。文明是程序,是功力,文化是成绩,是静体。”^①

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运用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方法开展中国社区研究的大本营。然而,他们在大力引介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同时,亦相当认可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理论。1925年至1928年,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深受以该校为据点的美国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影响。他不仅聆听该校人类学系主任鲍亚士及其女弟子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的演讲,还到纽约社会研究新校听鲍亚士弟子戈登卫然(A. A. Goldenweiser)讲解《人类学〈原始文化〉导论》。^②且吴文藻亦为乌格朋弟子,曾随其习社会学,深受文化社会学理论熏陶(《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04页)。1932年,吴文藻在为孙寒冰主编《社会科学大纲》所撰第三章《文化人类学》中,对美国文化人类学极表推崇,认为鲍亚士诸人首倡文化研究方法,所提文化概念“乃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上最伟大的贡献”,^③其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考察“开野外作业的新纪元”。^④1935年,他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文中,颇看重美国文化社会学者的现代社区调查,认为林德夫妇(R. Lynd & H. Lynd)《中镇:一种现代美国文化的研究》(*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1929)是“今后一切社区研究的模范”,亦为“近来社会学文献中一部空前的杰作”。其最大贡献是活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方法,“对于现代文明作全相的研究”。^⑤费孝通30年代亦受美国文化社会学影响。1935年12月,他曾与妻子王同惠将乌格朋《社会变迁》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第74页)。费孝通于1993年回忆,他翻译此书期间,对乌格朋所言印象深刻。^⑥黄迪原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被吴文藻派到芝加哥大学学习。1936年3月,他试图以美国文化重心说修正英国文化功能派理论。1934年,美国人类学者白乃荻(R. Benedict)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34)一书中,通过分析文化重心(core of culture),阐释各种特殊文化模式。1935年,爱尔乌德在《文化为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一文中,将文化分为两方面:一为主观文化,即“传统”(tradition),包括知识、观念、信仰、情操、价值和标准;二为客观文化,即“风俗”,包括一切外表的行为习惯,认为文化重心在于主观文化方面。^⑦黄迪读到白乃荻和爱尔乌德的论述后,感到“文化重心”概念非常重要,认为“文化中常有一两部分较占优势,较强有力,对于其他部分的影响特别重大”,这种“文化重心”是整个文化的枢纽。不研究“文化重心”,难以了解个别文化的特色。美国学界的“文化重心的研究,严格的说虽仍不出文化内部相关研究的范围,却不无相当足以补充功能学派观点的地方,至少也不缺提醒的作用”。^⑧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研究对象由人类体质转向人类文化,形成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又被乌格朋诸人应用于社会学领域,形成文化社会学。孙本文等自美返国的民国社会学者,深切感知到此种美国社会学新趋势,向国内大力引介此种研究范式。美国文化社会学对民国社会学研究影响深远,不仅与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范式共同构成民国时期社会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且与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共同构成民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① 余天休《社会学大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第68—69页。不过,余天休对文化的阐述并未参考乌格朋相关论述,此书第九章《左右社会之势力》参考书目仅列举孙未楠《民俗论》一书。参见余天休《社会学大纲》第74页。

② 参见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见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39页。

③④ 吴文藻《文化人类学》,见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65、59页。

⑤ 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见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56页。

⑥ 参见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⑦ C. A. Ellwood, Culture as an Elementary Factor in Human Social Life, *Social Science*, Vol. 10, No. 4, Oct. 1935.

⑧ 黄迪《论“文化重心”》,见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概论选读》,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1938年,第32—33页。

三、融会与贯通: 民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之构建

民国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大致始自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 尤以孙本文诸人的论著为代表。其核心为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其中包含美国理论因素颇多, 或谓以美国理论为蓝本亦无不可, 其中, 以爱尔兰乌德社会心理交互论、社会行为分析理论、文化社会学理论等影响为大。

孙本文为民国时期构建社会学理论体系之执牛耳者。其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 1928 年 7 月《社会学 ABC》为其始, 中经 1929 年至 1930 年社会学丛书的编写, 至 1935 年 1 月《社会学原理》, 而日臻完善。其可贵者, 乃在引介、融会美国各家社会学理论之余, 立足自我, 有所创新。然孙本文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严格说来, 并非其一人成果, 而是由其主持的集体研究成果。社会学丛书书目虽由孙本文排定, 但除其所撰《社会学的领域》、《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变迁》3 种外, 其他各种《都市社会学》、《社会的生物基础》、《社会组织》、《社会的心理基础》、《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地理基础》、《社会进化》、《社会约制》、《人类起源》、《农村社会学》、《社会研究法》、《社会学史纲》等则由吴景超、潘菽、寿勉成、黄国璋、黄文山、吴泽霖、游嘉德、杨开道、李剑华等分头撰写, 而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各章又多参考社会学丛书各书内容。且社会学丛书内容不仅为孙本文《社会学原理》采用, 亦为其他论者采用。吴泽霖 1932 年 6 月出版的《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分为社会学的领域、社会的各种基础(生物基础、心理基础、地理基础、文化基础)、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社会约制、社会问题的性质等章, 很多内容即以此丛书为基础编成。^①

孙本文于 1928 年和 1929 年分别在《社会学 ABC》和《社会学的领域》中, 以社会行为为中心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 社会学首先须研究制约社会行为的地理(气候和地形)、生物(人口数量与品质)、心理(社会态度与其机制)、文化(文化特质和模式)四大要素。其中, 地理和生物要素只是“消极限制”要素, 心理和文化要素则是影响社会行为的“根本活动”要素和核心要素, 社会行为“无非是人类心理作用和文化影响的交互作用的结果”。^②其次, 社会学还应研究社会行为的组织、控制与变迁, 诸如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社会进化等。^③他在此前后主编的社会学丛书书目, 即大致依此。

虽然孙本文全面申述了社会学研究领域, 但他更重视社会文化和心理问题。1935 年 1 月, 他在《社会学原理》例言中特别申明, 其社会学观念受美国乌格朋、汤麦史二人影响最大, “故全书注重文化与态度之讨论”。^④他在此书中重点说明, 在各种社会问题中, 文化和心理问题最重要, “社会生活的重要要素, 莫过于文化与社会心理的作用”。^⑤所以, 孙本文建构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即为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的结合。

孙本文一直强调,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 这种社会行为指人们的交互行为。1928 年 7 月, 他在《社会学 ABC》中即称,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科学”, 社会行为即“二人以上交互影响的共同行为”。^⑥1935 年 1 月, 他在《社会学原理》中, 强调从社会行为角度理解社会概念, 认为“凡是具有交互与共同关系, 与表现交互与共同行为的一群人, 都可称为社会。或简单的说, 凡表现社会行为的一群人, 就可称为社会”。“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 在社会上各分子间表现交互与共同行为。此种交互与共同行为, 便是社会成立的根本要素”。^⑦孙本文将社会交互行为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 系综合爱尔兰乌德社会心理交互论与派克、蒲其斯《社会学导言》相关论述的结果。他强调社会行为具有

① 参见吴泽霖《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目录, 上海: 新国民图书社, 1932 年, 第 1—3 页。

②⑥ 孙本文《社会学 ABC》, 上海: 世界书局, 1929 年, 第 23—24、3—4 页。

③ 参见孙本文《社会学的领域》, 第 46 页。

④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 例言, 第 2 页。

⑤⑦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 第 128、7—8 页。

交互性质 源自爱尔乌德观点;而他将社会行为视作社会学研究对象,则直接源于派克、蒲其斯所论。派克、蒲其斯认为社会学是研究共同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科学。孙本文认为,“共同”(collective)一词不如“社会”一词更具“概括”性,所以,他进而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为“社会行为”。^①其实,孙本文对派克、蒲其斯《社会学导言》推崇备至,强调“有志研究社会学者不可不读此书,如能阅读两三遍,则所得尤多”;“全书所分章节及所作引论均出于派克教授的手笔。其所论述,足以代表司马尔教授所领袖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说。此书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科,既用作初级社会学教科书,亦用为高级学生及毕业生研究社会学必须参考之书。故有芝加哥社会学科‘圣经’之目”。^②

孙本文构建的社会学理论,既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又以文化分析为基础,将社会文化研究视作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1934年8月,他在《社会学原理》自序中表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而“求生”为人类共同生活原理原则的中心要义。为了“求生”,人类社会必须进行“调适”,对内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对外解除环境之“侵迫”。而文化是影响人类社会调适的关键要素,“人类满足需要,解除侵迫,以调适环境而求生存者,其枢纽惟在文化”。^③他强调人类态度与行为源于所处社会环境,主张将社会行为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分析。1929年8月,他在《社会的文化基础》中说:“文化虽是人的产物,但一经产生以后,人即受着文化的束缚,处处表现文化的色彩。所以,质言之,所谓个人——即我们所见的个人——无非是文化陶冶而成的个人。”^④1935年1月,他在《社会学原理》中又指出:“人的一举一动,是受社会上文化影响后得适当刺激引起的结果……人的种种行为,是在社会上人与文化的环境中,渐渐学习而养成的。”^⑤如此,孙本文就将社会行为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强调人的行为是处于各种文化环境之中的行为,要研究人的行为,必须结合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才能有成。

孙本文融会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学术思路,与其学术经历有很大关联。他很早便受染于美国心理社会学理论。1914年至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康宝忠的讲授了解到季廷史的“同类意识”说(《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24页)。1921年至1926年在美留学期间,他同时深受心理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两派理论熏染。他于1922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早期心理社会学泰斗季廷史与文化社会学创立者乌格朋,在纽约大学师从研究社会心理的麦独孤(R. McDougall),1925年获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秋,他又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师从注重社会心理行为研究的派克和范黎庶学习。所以,孙本文自1926年回国后,一直将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两种社会学理论置于同等地位。由其1928年9月辑为《文化与社会》的论文所含两种理论内容各半来看,他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几年间,对两种理论均予以大力宣扬。1928年6月,他在《社会学ABC》例言中亦申明,他特别重视文化与态度两方面对社会行为的作用,“著者相信,一切社会行为,不外乎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⑥他于1927年1月出版的《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不仅在国内学界最先介绍美国文化社会学理论,对汤麦史人格分析理论亦为首次介绍,他自称“此书在当时看来,是一部介绍美国社会学重要学说的新著,在我国社会学发育时期,此书似有相当重要性”(《当代中国社会学》,第193页)。

不过,孙本文将社会心理行为分析与社会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仍源于美国学界。在他看来,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社会行为分析与人文区位学理论强调结合社会环境分析人们心理行为,所言社会环境与文化无异。他于1944年12月介绍,汤麦史、派克和蒲其斯等“注重社会态度与愿望的

①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第16页。

②⑤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第252、237—238页。

③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序,第1页。

④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第125页。

⑥ 孙本文《社会学ABC》例言,第1页。

研究,亦以偏于心理方面,但彼等并不轻视文化的因素”,“心理社会学,就近时趋势看来,已与文化社会学发生密切关系。大概研究心理社会学者,多同时注重及文化因素”。^①他介绍,汤麦史于1918年在《欧美波兰农民》第1卷中提出,分析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与社会态度(social attitudes)同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他又注意到,乌格朋、恺史等美国文化社会学家亦不忽视社会心理行为研究。乌格朋在《社会变迁》中虽批评心理派社会学过于注重心理要素而忽视文化要素,但并不完全否认心理要素(《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64页)并强调从文化环境中理解人类行为,认为人类行为是本性与文化的混合物(《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60页)。恺史在《社会学大纲》中提出,社会现象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两方面,所以,“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团体行为之主观及客观二方面之科学。由人类学所集之文化(或社会价值)材料,以说明客观方面;由社会或团体心理学所讨论之社会态度,以说明主观方面。惟其联合二方面,以研究其交互作用,乃有适当之发端,以研究团体之行为也”(《社会学上之文化论》,第138页)。

许仕廉、吴景超、应成一、吴泽霖等亦意识到融会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问题。1929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即认为,中国要开展都市调查,须掌握“一点方法及有用的概念”,既须以汤麦史《欧美波兰农民》、派克与蒲其斯《社会学导言》为理论指导,亦须以孙末楠《民俗论》、乌格朋《社会变迁》为理论指导。^②1927年12月,许仕廉亦由汤麦史社会价值与社会态度理论注意到兼顾文化与心理行为分析问题。他介绍,汤麦史在《欧美波兰农民》第1卷中将文化与社会态度、社会行为密切联系。^③汤麦史提出,社会价值与态度相互影响,由此形成诸多思想、言语、制度、美术等种种生活方法和理想。“文化”就是这些东西的总称。^④1932年11月,应成一在《社会学原理》中提出,社会学不仅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还要研究外在的社会文化。社会除人之外,尚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要因,应为“在一个特别环境——自然或社会——之下,所结合之个体”,既包括人的要素,亦包括事的要素。^⑤吴泽霖亦于1932年6月在《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中强调兼顾社会文化要素与心理要素的研究,认为“我们对于一个人可以有两种看法:可以看作作为一种生物人,专门研究他的生理、心理的构造和作用;也可以看作一种社会人,专去研究他与其他人的相互关系及影响”。为了研究“社会人”,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⑥

孙本文诸人融会美国文化社会学与社会行为分析理论,构建起以社会行为为对象、以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的完整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为民国社会学界普遍认可。民国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日臻完善。其理论核心为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此种理论承20世纪初日渐兴盛的美国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理论之余绪,具鲜明的美国学术印记。社会行为分析以芝加哥大学为研究重镇,强调结合社会环境分析人们的外在行为;文化社会学以哥伦比亚大学为研究中心,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注重研究社会文化。两种理论皆为20世纪一二十年代美国新兴社会学理论。孙本文等由美返国的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在大力引介这些美国最新理论的同时,多取融会贯通之意,并力图有所创新,从而构建中国自身社会学理论体系。由此而言,20年代以降,民国社会学研究在时间上几与美国同步。而且,就将美国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理论综合为一个理论整体而言,民国社会学界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确有相当创新性。

(责任编辑:王丰年)

① 孙本文《现代社会学的发展与趋势》,见孙本文主编《现代社会科学趋势》,第28页。

② 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83—84页。

③④ 许仕廉《论东西文明问题并答胡张诸君》,见许仕廉《文化与政治》,第46、48—49页。

⑤ 应成一:《社会学原理》(上),第82页。

⑥ 参见吴泽霖《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第19页。